

## “佛教研究與敦煌文獻工作坊：青年學者與郝春文教授的對話”活動側記

2022年4月1日，“佛教研究與敦煌文獻工作坊：青年學者與郝春文教授的對話”活動如期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所在的壯思堂 (Jones Hall) 舉行。工作坊邀請了數位普林斯頓大學相關專業的博士研究生報告他們最新的研究成果，並有幸邀請到正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訪問的首都師範大學燕京人文講席教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郝春文教授對青年學者們的報告進行點評。活動由普林斯頓大學宗教系的太史文 (Stephen F. Teiser) 教授主持；在熱忱的歡迎致詞之後，工作坊由兩場長報告與五場短報告組成。

首先，普大宗教系博士候選人Sinae Kim《為佛演說，作為佛的演說：中古晚期佛教演講者的文學技巧》一文，通過系統梳理現存的29件敦煌講經文寫本，分析並總結出講經文本中廣泛運用的文學技巧與修辭手段，揭示出這些寫本背後的講唱活動中，講師對於經文既可刪減省略、又可延展補充的能動作用：他們不僅“為了”佛講演，更是在講唱活動中“成為”佛本人。作者認為，現存的29件敦煌講經文寫本不僅是佛典文獻的不同側面，更是如實反應特定歷史場景中法師如何向不同聽眾唱誦、解釋、與表演佛經等學習活動的珍貴紀錄。這一時期，儘管佛典經論多已通過六世紀以降的經典化過程寫定，但這一時期的絕大多數俗眾仍舊通過“聽講演唱活動”（而非“閱讀寫定經文”）的方式得習得佛法。在這種背景下，聽眾所聽授的演講便既可能詳細而深入、又可能簡明而短小——而這皆是具體講唱法師通過大量闡釋、教導、與文學修辭技巧編排內容、主動剪裁改編經文以適應不同知識水平的聽眾的結果。這種“既可擴展又可省略”的演說技巧，被作者生動地比喻為“手風琴式/折疊式的敘事結構 (Accordion Structure)”;也正是通過講師在不同場合基於不同對象的對經文的剪裁增刪，使得原本艱澀難懂的文本曉暢易懂、講經的過程知識性與趣味性兼具。作者將全文分為三個章節，分別從“徵引的修辭功能”、“重複的技巧”、與“演說、敘事、與對話”三個角度對將經文文本進行分析。

對於這一報告，郝春文老師認為，這篇論文選題新穎，分析深入細緻，理論上具有寬廣的國際視野。通過將敦煌講經文文本置於“講”和“聽”的演講場景中，重點分析了演講者如何解釋經文，以及聽眾如何接受。這是一個全新的考察視角。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兩點創新：一是文本角色的轉換，原來的研究者只將其看作解釋經文的文本，這篇論文則將其看法師講經的講稿；二是研究者將講經的法師和聽眾引入到研究中。作者的分析細緻入微，將講經文文獻置於講經的歷史場景中，對文本內容取得了新的理解和認識：作者運用詮釋學的分析方法對敦煌講經文文本進行解構，分成幾個方面對講經文之“引文”、“重複”、“演講”、“敘述”、“對話”等解釋經文的技巧做了深入系統的分析。比如對於“重複結構”、講經文的口語化和音調變化特點等。同時，在學術視野上，吸納了世界範圍內對多種經典文本的詮釋學分析的成果。同時，對講經文寫本文獻與文字也有著很好的把握。

總體而言，本文已取得了出色的研究成果；作為展望，一是和敦煌寫本經疏的比較研究。經疏是主要用於文字閱讀的文本，講經文則是法師口頭講經的記錄或講稿。二者進行深入比較將更能凸顯講經文的口語化和表演特徵。二是基於講經聽眾視角的考察。其實，在講經文和其他表演類敦煌寫本中，表現聽眾配合的資料還是很多的。所以，今後開展以聽眾為中心的考察，分析聽眾是如何與講經法師互動的，也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隨後，普大宗教系博士候選人翟旻昊《中古中國的儀式文合集：以敦煌寫本S. 2498為中心》一文，從英藏敦煌寫本特長卷軸S. 2498入手，全面梳理了其中包含的豐富內容。作者指出，如《雜陀羅尼集》和《陀羅尼集經》，S. 2498可以被視作敦煌當地的術士整合各類實用

儀式的嘗試。寫本中所包含各類儀式，包括符、印、呪、祈請文、壇法等來源多種多樣，既包括從翻譯佛經中截取的片斷，也包括明顯是本土編纂的內容，還有中土人士做造成梵文音譯形式的咒語。作者還認為這些內容並不是隨意抄在一起的大雜燴，它們中不少都相互呼應。作者還從寫本的物質特征判斷，該寫本的製作和使用包括了多個術士。這些術士在使用過程中，不斷地對其中內容做了修改和補充。

作為回應，郝春文老師認為S. 2498是內容極為豐富的佛教法事儀軌，對了解中國古代佛教與道教、民間信仰的交融，以及佛教與社會的互動關係都具有標本意義，故值得作為個案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郝老師贊同作者指出的此卷不是為某人做功德而抄寫的，而應該是某位專業人士使用的文本。並且，S. 6417也是與此卷功能相似的佛教法事文書，其上有“貞明陸年庚辰歲二月十、廿日金光明寺僧戒榮裏白轉念”，多處題有“戒榮文一本”，說明S. 6417就是專業人士金光明寺僧戒榮的文本；S. 6417可與S. 2498可互為佐證。此外，此件雖然包括道教因素和民間宗教因素，但整體上看似乎還是應該確認其為佛教的密教文獻，故建議定名為“密教符印及壇法”。

此外，郝老師也指出，此件中的“嚴君會”又見於P. 4640V“歸義軍己未(899)至辛酉年(901)布紙破用曆”，其中共出現六次。由於人名“嚴君會”相對少見，故可基本確定S. 2498與P. 4640 V的“嚴君會”當是一人；根據P. 4640 V之斷代為公元899至901年，故可推定第一，S. 2498的年代當是在九世紀末十世紀初的張氏歸義軍時期；第二，根據P. 4640 V的相關記錄，“嚴君會”的身份是歸義軍押衙，故當是S. 2498的施主和服務對象，不是該長卷的抄寫者和所有者，該卷的抄寫者和所有者應該另有其人。據此，便可繼續深挖該寫卷背後的時代背景與卷中內容之分合等相關問題。

兩場長報告之後，活動安排了五場短報告。

首先，普大宗教系博士候選人凱麗(Kelly Carlton)《寒霜摧新花——中古中國亡故兒童的佛教紀念活動》一文中提出，敦煌寫本中保存的佛教儀文《齋文範本》中，“亡文”提供了大量中古時期關於“死亡”以及“來世”概念的珍貴信息。本論中，作者檢視了為亡兒而作的各具特色的祭悼文獻的文學特點與禮儀內涵；通過將這些文獻與同時期靈驗故事中與兒童有涉的相關段落進行比對，作者認為對於亡兒的紀念活動反應出更為深廣的中古時期的佛教觀念：比如兒童面對死亡威脅的脆弱特質，兒童引導自我進入來世的能力，以及在兒童身上折射出果業報應傾向的關念等等。

隨後，普大東亞系博士候選人杜亞琳《“意樹發空花”——重訪敦煌323窟南北壁敘事圖像》一文，關注敦煌323窟內南壁和北壁上的敘事圖像。與對323窟現有的研究不同的是，杜亞琳試圖將研究重點由這些圖像“是什麼”轉至這些圖像“看起來像什麼”，意即從尋找圖像的文獻來源和歷史背景，轉移到探究圖像在作為一個整體的洞窟內的視覺效果、文化象征和儀式功能上來。

普大宗教系博士生翁程聲(Echo Weng)《對佛身的渴望：敦煌文獻中的身體變形敘述》一文，以敦煌文獻《醜女緣起》為中心，探討中古佛教文學中身體的形象和女子得佛身的文學母題目。通過比對數例相關文獻的不同記載，作者仔細梳理了這些文例中敘事細節與理論體系的影射，認為“緣起”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有時並不完全等同於變文。

普大東亞系博士候選人肖芸曉的報告《七封契約，兩兄弟，一幅卷子：敦煌寫本S. 3877的寫本學觀察》認為，寫本與其使用者之間存在複雜的動態關係，寫本背後或存在多次且多樣的歷時書寫活動。如敦煌寫本S. 3877中存在多幅地圖、七封契約、與文學雜抄——作者認為七封契約非是以往認為的習字組合，而是全部屬於令狐家族，當被視為個人或家

族交易的跨越幾十年的歷史記錄。將該卷子視為一個物質整體，它的寫成經歷數次書寫習慣的變化：包括“正—背—正”反復、上下反轉、書寫方向也從左向右寫調換為從右至左。這種書寫卷子的複雜過程，恰展現了書寫載體及其使用者的動態互動，寫本不僅紀錄歷史，他的製作、使用、再製作、再使用，本身也是歷史一環。

普大建築系碩士生張綺真(Priscilla Zhang)《唐代敦煌地區建築與居住儀式研究——從入宅文看居住日常中的宗教性》一文，通過對有關居住儀式的敦煌願文的再分類，以及對入宅文內容和特定文體的分析，本文意在探尋敦煌居住儀式背後的人民生活，並從世俗性和宗教性兩個角度觀察佛教和道教如何共同影響敦煌居民以及僧侶的生活及思想。

隨後，在場觀眾對會議內容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比如在聽講活動中“佛”的意象的複雜內涵、如何在海量敦煌卷子中串聯起相關內容、中古寫本中書手或筆跡的分類標準等話題。除了上記的與會學者外，另有多位來自普林斯頓大學宗教系、東亞系、歷史系、以及其他研究機構的相關學者到場參與討論。隨後，在歡快的晚宴中，本次活動圓滿落下帷幕。

4月14日，在太史文教授的倡導下，發表者們又就工作坊涉及的相關話題進行了一場會後討論，對一系列未竟的問題與相關研究作出更為深入的思考。比如，師生們反思了學界對長安地區材料的過度重視而對邊緣地區材料的不當輕視，又比如應當將敦煌文獻的整理與研究與更全面的中古中國研究相結合。此外，涉及的話題還包括郝春文教授對於卷子製作者與使用者的分別，以及作為工作文獻的卷子使用存在相當程度的靈活性等等。

最後，本活動衷心感謝旭日全球佛學網絡，普林斯頓大學文化、社會、與宗教研究中心(CCSR)，佛教研究工作坊(BSW)，普大東亞研究項目，以及普大宗教學系的大力支持。

(會議記錄：肖芸曉，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博士論文題為《抄工、學者、及其書寫活動：簡牘時代寫本的製造與生成》。)